



何英 /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美国媒体与 中国形象

1995-2005

American media &
China image



美国媒体与 American media & China image 中国形象

何 英 /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序 一

当前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关系日益密切，传媒与政治的互动问题，传媒与国家形象问题等早已不仅仅是传播学研究的课题，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热点话题。传媒在文化与政治变革中以及人们的心态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早已为人们所认识。我国学界关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研究，著述颇丰，其中，对美国媒体的研究也常有涉及，但多数是从政治文化、权力结构、国内政治等范式或混合分析的角度去研究美国媒体，而从建构主义角度去分析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现象的著述则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何英博士的这本专著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前瞻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新锐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之光，把行动者与结构的关系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来，一方面把矛头对准主流理论对行动者-结构关系的功能主义理解，另一方面，在非主流理论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等理论视角。虽然这种争论还没有也很难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但这种争论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本书作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合理部分——结构互动观，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对理解世纪之交的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新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美国国家利益、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

及舆论民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反映。因此，不能用静止、浅见的眼光看待，而应该用发展的、互动的观点来加以观察和分析。作者从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入手，以建构主义这一非主流理论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为进一步理解国际政治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值得赞赏和鼓励。作者的研究思路在学术上有显著创新，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这样研究问题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作者在第一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美国媒体的阶级属性和局限性，它受到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牵制。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以意识形态划线，国家利益至上，跟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问题的立足点。因此，美国媒体虽号称拥有新闻自由，但它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不可能做到客观和公正。这一论断是全书的主线，是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作者在第四章中对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作了补充和完善，指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处于洛克文化的状态，两国关系有过多次的跌宕起伏，但总体上不再以敌手身份去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双方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这一论断基本符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中美关系近十年来的走势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上的前瞻性。作者在第五章中还对中国如何“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媒体和舆论如何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简要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该章不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而是补充性的结论性内容，但作者的见解引人深思。通读全书，深感作者具有敢于挑战传统理论的勇气和开拓精神，也看到作者有着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和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格，后生晚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理应得到学界前辈和同仁的鼓励。

希望作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中美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美国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之大是极为突出的，在新中国外交5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始终是最主要的角色之一。因此，在研究中美关系时，要把它放在冷战后的国际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作者可按照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对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提出政策建议，加强对美工作，增进两国人民和社会各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寻求两国利益的汇合点，尽一切可能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轨道向前发展。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扩充和深化。作者参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文献和资料，博采众议，又有新的视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到了资料丰富翔实，言之有据，分析严谨，有的见解可圈可点。本书各章节相互关联紧凑，脉络完整，思路清晰，文字优美，表达流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力作。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在对美国媒体的研究方面拿出更多的新成果。

看到学生学有成就，总是十分高兴的。欣然提笔，是为序。

姜琦

2005年5月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姜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东欧问题著名专家，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上海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序 二

近百年来，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数次科学技术革命中，生产力的发展一次次得到了突破，开创了人类社会一个个新纪元。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开始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动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为标志，使人类开辟了无线电报、广播、雷达、无线电通讯和电视的新时代，再加上原先已有的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从此开始了媒体与政治相互交织和影响的时代。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信息时代都已经到来，它已经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世界中。国际政治学者应当一起努力开展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尤其是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者，不仅要从传统的角度、用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而且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风云变幻的政治大背景以及其中的动因。

建构主义是近20年来在国际学界出现的较新的话题，国内外对于它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建构主义的研究，国内目前基本还是停留在描述阶段，表现为描述多于探索，现象多于本质，特征多于规律。至于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来探讨和研究媒体传播现象问题，在国内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在这一阶段，如何防止庸俗化的倾向，如何从描述现象到进一步探索现象的深层原理，到最后总结提升阶段，使政治科学研究不断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是一个新的课题。行动者和结构是社会学中的

一对核心概念，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一直是社会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两者关系的争论折射出社会学的发展高度，也反映了社会学的理论分野。这一对范畴的关系在社会学中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而在国际关系中围绕它的争论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最后的答案。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我们对国际政治本体论进行进一步思考，而国际政治本体论恰恰是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所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种争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但这并不妨碍国际关系学者利用目前的社会学理论去探究国际问题的奥秘。何英博士的这本专著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温特所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动者—结构问题，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认识论。本体论涉及的是行动者和结构的性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解释形式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和结构的性质在因果分析上的重要性；第二个是行动者解释和结构解释在社会理论中哪个相对重要。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表面上具有强烈的反还原主义特征，它是从结构的层次而不是从行动者的层次来解释国家的行为。而实际上，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在本体论上仍然是还原主义的，国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先于体系和体系的结构，体系的结构不过是国家（行动者）的创造物，体系的结构约束了行动者，行动者外生于体系的结构。温特的结构论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体系，要把这个理论体系说清楚，并非易事，即便是国内的学术大家和资深学者也不例外，而本书作者表现出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抓住了温特结构论中的一个视角——结构互动观进行发挥，把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原因分析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实属难能可贵。

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代表了国际政治研究与传播媒体研究跨学科结合化的趋势。人类社会自从进入信

息时代，媒体与政治和人们价值观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媒体与政治紧密互动的一些现象已经不能完全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来诠释了，至少这种单一的诠释是牵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这就为一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出现和运用提供了平台。本书作者对媒体传播现象特别是美国媒体对华报道问题长期注入了兴趣并重点关注，在考察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时，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大胆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是观念、身份、利益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中美关系是洛克文化的建构，中美关系是文化建构主义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等等。虽然对这些理论的延伸论证仍需要走相当长的路，但是这些新的思路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作为作者的导师，我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选择这样一个全新的课题，并大胆进行自己的探索与思考。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书后所附的文献资料对媒体传播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是非常好的参考。同时，本书的系统性也使其在信息时代的可读性加强，不仅为国内的建构主义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该课题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人愿为此书欣然作序，希望各位学界同仁能以宽厚之心扶持后生晚辈的成长，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多提宝贵意见，以利作者今后的提高和进步。

倪世雄

2005年5月于复旦大学

倪世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自序

此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所经历的思想上的锤炼和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和想象的。现在这本小书历经磨难终于成书了，我的心情惴惴不安且惶惶然，希望能与所有知我懂我的读者一并分享我的心情，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

本书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不能充分解释这个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和现象，而建构主义则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崭新视角。他认为，国家和国家体系的结构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在的和可知的，这和经验主义的观点——存在即被感知不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承认不可还原的、潜在的、观察不到的社会结构的实在性；强调需要一种实践理性和实践意识的理论，来解释人的意向性和动机；通过对行动者和结构进行辩证综合，克服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不足；社会结构与时间和空间结构不可分开。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结构的成分可能是行动者、实践活动、技术和领土，其内在关系不可能还原为各组成部分互动的特性。在国际体系的结构中，行动者是国家，国家是指国家与其他国家内在关系的结果，而不只是国际事件的原因，国家体系的组织原则把国家建构成单个的决策单元，国家对他们的行动负责。总之，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依赖

于并由行动者的实践和自我理解建构，这些行动者的因果力量和利益由结构建构并加以解释。本书以上述理论为支点，着重分析了美国媒体名记、专栏作家与中美关系大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之间互动的情况。

本书在结构上共分为五章，以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威胁论”为平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论根源和规律。本书的起迄时间是1995~2005年，全书中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诸多事件有所侧重，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的对华有关报道因篇幅所限未着重提及。

第一章是全文的起点和铺垫，简要介绍了美国媒体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结构和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特点，提出了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欠公正性这一核心议题，同时指出，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结构、美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中美两国舆论和民意的结构性互动。

第二章是案例考量，重点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威胁论”报道中，美国媒体记者与中美关系结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两国舆论和民意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美国媒体对美国“领导者”身份和中国“威胁者”身份的认同使“中国威胁论”成了美国媒体的价值观，美国媒体自身在报道中又进一步张扬了“中国威胁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源头，美国媒体的报道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媒体对华报道虽未言明，但实际是绝对参照的标尺，美国媒体在具体报道中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国家利益。在上述互动中，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日益充满强烈的价值取向，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美国政府和舆论及民意对中国应有的正常的研判和认知。

第三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详细阐述了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

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物质性建构，更是社会性建构。观念是确定国家身份的根本因素和国家利益的根源。观念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认同，并与身份和认同一起共同塑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也不断被它们强化。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就是这样被构建的。互动是被建构而成的，自我和他者在不断的互动中共同界定了对方的身份。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建构的，美国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就是观念、身份、认同与利益的共塑与融合的结果。观念、身份和认同与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就是观念，但并非所有的观念都是利益，它们之间是充分条件；身份塑造了利益，但是，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它们之间也是充分条件；认同界定了行为体的利益，集体认同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与利益之间还是充分条件。总之，观念、身份、认同和利益的互动关联模式是：观念建构了身份，身份塑造利益，因而观念建构利益；观念和身份建构利益的认同，社会互动重塑认同，进而改变利益。如果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国家之间的互动产生共有观念，该共有观念界定了两国相对的身份，也确定了两国间的相对利益；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的同时，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形成集体认同；集体认同再通过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选择和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界定出最终的国家利益。

第四章在前几章论述的基础上，对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作了补充和完善。同时提出了三个重要理论命题：一是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体现了学习进化理论的缺陷。建构主义认为，作为社会实体的国家对它们自身的学习、彼此的学习和与他者有关联行为的学习都是片面的，美国媒体对华负面观念的形成真实地再现了学习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观既摆脱了

行为主义学派机械、僵化的教条，又与虽然也强调个体学习的内在心理认知过程，但是，该认知过程与完全无序、随意和混乱的学习进化理论区别开来。二是运用观念建构利益的建构主义观详细论证了美国媒体国家利益观的形成，观念是美国媒体国家利益观的基本路标，集体认同是国家利益观的必由之路。三是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主要不是文化帝国主义而是文化建构主义，是中美两国历史和文化、民族性格和心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以及舆论和民意等因素形成的三层文化建构。中美关系是洛克文化的建构，构建了具有明显洛克文化特征的中美间安全文化。

第五章是本书的结语部分，有重要的画龙点睛之功效。一方面，对全书的主要观点作了必要的总结和归纳，另一方面，从美国媒体对当前的热点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认知的角度，谈了一些个人的理解。既然本书把“中国威胁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案例和分析平台，而“和平崛起”又可被视为中国对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蔓延的“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应对，那么本书的最后对中国如何“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媒体所代表的美国舆论和民意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等问题作一简要分析，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本书的最后得出了四条重要结论：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论根源在于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中国威胁论报道体现了美国媒体记者与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两国舆论和民意以及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互动；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体现了学习进化理论的缺陷；中美关系是洛克文化的建构，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实质并非文化帝国主义而是文化建构主义。

在本书得以付梓之际，衷心感谢所有真心帮助我的人，在本书最后的致谢中我都有提到，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希望能听到您更多的真诚回应，恳切欢迎批评和斧正。

前 言

何谓传播？它是指将观念由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或者是个人自身内的传播，其宗旨是使接受传播的人获得思想上的了解。当前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均发展迅速，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对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两个交叉学科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传媒与政治的互动问题、传媒与国家形象问题等早已不仅仅是传播学要研究的课题，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热点话题。学界有关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研究，多是政治文化、权力结构、国内政治等范式或混合的分析。例如：在大众传播与受众的关系问题上，学界主要从两个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一是“媒介使用和满足”，二是“媒介依赖”。前者主要考察受众进行媒介消费的社会心理动机及需求，而后者则强调媒介、受众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在这两个不同理论视角中，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大众传播体系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物，个体不同的媒介使用动机与需求也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并且为社会环境所制约；二是受众寻求信息的不同动机和需求导致了不同的媒介行为，从而导致了媒介、媒介内容和可替代性功能的依赖，这种传播活动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最终对社会结构、媒介体系的结构、内容及功能产

生影响。^①本书的立论正是建立在媒介、受众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交叉结合之上。

政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向，相关的传播理论主要有社会理论、知觉理论和功能理论，其中功能理论又包括散播说服与信息论、游戏理论、同社会理论及使用用户满足理论等分支。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政治传播学可以说是结合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及法学等学科的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博大精深的学问，其主要研究方法有：历史研究法、文化发展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心理学研究法以及冲突研究法、法律研究法、权力研究法、制度研究法、群体利益研究法、决策研究法、集体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事后回溯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系统分析研究法等等。本书正是以个案研究法为基础，综合运用了历史、文化发展、社会学、心理学等系统分析和调查方法，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问题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考量，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在于美国媒体与美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及两国舆论和民意之间的互动，而并非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近些年来，经济及政治的全球化大大推动了传媒的全球化，同时，传媒的全球化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传播有优势的国家在影响他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问题。如美国自由、繁荣、快节奏和多种族文化交融的正面形象以及暴力、色情、种族矛盾等负面形象已为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所广泛认同，尽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未亲眼目睹。当前的全球主流话语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其绝对主导下的媒

① 参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2002 级博士生李晓静的论文《中国大众传媒与社会民主化——以“媒介使用和依赖”理论为视角》，原文收集在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之“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新闻学院博士生论坛论文集中。

体话语霸权的不对等势必会引发各国因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的冲突。美国媒体正是在这一独特而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掌控下，自觉自愿地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塑造出了一个负面的“妖魔化”中国的形象。本书以美国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为平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着重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创新，认为美国媒体负面报道中国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媒体“蓝队”（保守派记者和专栏作家）与中美关系结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中美两国舆论和民意之间的互动。美国媒体在上述互动中形成的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观念经过层层渲染，进一步成为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同时，经过建构形成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反过来又深深左右着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舆论导向。本书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为推动国内学界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更深入研究作些努力，这也正是本书的理论意义之所在。

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非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利用社会学中的后结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结构化理论等，对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重新审视，着重关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或未被注意到的空间，特别是以古典微观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假设为依托，提出了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这样崭新的理论思路。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学者认为，主流与非主流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解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实在，还是蕴涵了社会意义，是一种社会实在。同时他们利用结构化理论揭示了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之间不再是一种线性决定关系，社会结构的成分可能是行动者、实践活动、技术以及领土，其内在关系不可能还原为各组成部分互动

的特性，这些成分不可能独立于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来定义，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国家与其他国家内在关系的结果，而不只是国际事件的原因。简言之，在温特的理论中，行动者是国家，国家对他们的行动负责，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正如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并由行动者的实践和自我理解建构一样，反过来，这些行动者的因果力量和利益由结构建构并加以解释。总之，社会不是人的能动作用的无条件产物，也不独立于人的能动作用而独立地存在，个体的行动既不完全决定社会形式，也不完全被它们所决定，这样就避免了个体主义的还原论和结构主义的物化论。

建构主义在互动层面上的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拓展影响深远。我们是否可以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建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建构主义的模式，将温特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基本观念结构，据此考量两国之间的关系？建构主义的以观念为主的利益观分析为我们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研究就是建构主义观念分析理论的尝试性运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理地位。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重新设定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只考虑国际体系结构中“物质的分配”，从根本上忽视了观念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则作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首次将观念引入国际体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它虽然也承认物质的意义和作用，但更多地关注观念的分配。

本书的理论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从建构主义结构互动的视角看待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这一重要思路，认为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是记者和专栏作家（报道的主体）与中美关系结构中

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舆论和民意等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1. 从对结构的因果评判来看，美国媒体负面报道中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系统的建构，而并非某一孤立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使中美关系的定性和定量都变得更为多因化，仅仅依靠一种因素或手段无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若用传统的因果论解释中美关系，由于它是用孤立的观点看待一个个独立的因素，很难做到全面理解和领会，因而必须把中美关系放在结构中去考量。同时，美国媒体负面报道中国也是一个结构性现象而非偶然性现象，不是在中美关系危机时才出现的而是长期现象。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现象不是偶然的、时有时无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是有强烈规律性的系统的建构，危机的出现与否或力度的大小和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充分证明美国媒体是否对华负面报道或改变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性质，因而不应当把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问题简单化和单因化。2. 从观念的建构作用来看，强调观念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所体现出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重要建构作用。“领导者和救世主”观念构建了美国的霸主身份，“极权和专制中国”观念构建了中国的威胁者身份，然后通过媒体的作用成为美国民意和舆论共识，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上，最终形成美国捍卫民主的国家利益。观念来自行动者的社会性实践活动，是确定国家身份的根本因素和国家利益的根源，是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之间互动中建构的，国家利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观念建构了身份和认同，观念、身份和认同与利益的互动、共塑与融合最终形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因此，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不是先验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后天的观念建